

冬奥会上的体育仲裁案

□ 周青山 吴兰馨

作为四年一届的世界顶级冰雪赛事，冬奥会再度如约而至。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大幕已于北京时间2月7日开启。

为了保障冬奥会的顺利进行，国际体育仲裁院在意大利设立临时仲裁庭，解决冬奥会开幕式前10天至闭幕式期间的相关争议。自1998年长野冬奥会以来，国际体育仲裁院在历届冬奥会上都设立临时仲裁庭，并作出了一些有影响的裁决。从中，我们可以从法律角度了解冬奥会的另一面。

参赛资格争议

参赛资格对于运动员极其重要。失去参赛资格，意味着运动员无法登上奥运会这一重要竞技舞台，多年的训练汗水付诸东流。但是，能够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毕竟是有限的，因此在奥运会参赛选拔过程中，自然也会产生一些争议。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澳大利亚国家奥委会与国际雪车联合会因为参赛资格问题发生争议。澳大利亚在已经获得男子项目参赛名额的情形下，又申请额外获得女子参赛名额，理由是：国际雪车联合会有一项政策，就是没有通过资格

赛获得参赛名额的大洲，该大洲的国家奥委会所属的男子和女子运动员可以申请参加冬奥会，但中申请的运动员应该在2008-2009赛季或者2009-2010赛季至少参加了5项国际雪车联合会举行的国际性比赛，并且世界排名位于男子前50名，女子前40名。

国际雪车联合会拒绝了该要求，认为澳大利亚已经有男子运动员参赛，该规则只有该大洲没有任何运动员参赛时才适用。但澳大利亚奥委会认为，应该将女子项目与男子项目区分开来，大洋洲没有获得女子项目的参赛名额，可以额外获得女子参赛名额。

仲裁庭最终支持了澳大利亚国家奥委会的请求，其理由是：男子比赛和女子比赛各自独立，分别开展，因此运动员也是独立选拔、派遣，国际雪车联合会的规则中也明确使用了男运动员、女运动员的用词，且用“和”进行连接，应该理解为男运动员和女运动员是分别派出参加奥运会的。最后，仲裁庭建议分配一个额外的名额给澳大利亚女子运动员。本案体现出体育仲裁保障运动员参赛资格这一价值导向。

本届冬奥会上，有一起参赛资格案涉及雪橇项目的参赛名额分配。2026年1月28日，爱尔兰雪橇联合会提起仲裁申请，认为国际雪橇联合会未将一个剩余的奥运会参赛名额分配给爱尔兰，而是将其分配给了中立运动员，这一决定不符合规则。仲裁庭经过审理后认为，2026年1月16日至1月18日，国际雪橇联合会在德国奥伯霍夫举行的世界杯赛事期间，已经就此问题作出了决定。1月22日，爱尔兰雪橇联合会致信国际雪橇联合会提出抗议。因此，双方之间的争议发生时间显然在1月27日之前（即早于冬奥会开幕式前10天），仲裁庭对此案不具有管辖权。

比赛成绩争议

现代竞技体育，比赛成绩不仅关乎运动员的荣誉，也与运动员的经济利益紧密相关。但实践中，因为各种原因，运动员对比赛成绩可能会产生疑问，此时，也可以将争议提交临时仲裁庭解决。对于比赛结果纠纷，仲裁庭的审理一般原则是尊重赛场判罚，除非出现裁判员渎职、受贿、恶意裁判等特殊情形。

2006年都灵冬奥会短道速滑500米比赛结果纠纷就是较为典型的一例。在这项比赛中，我国运动员王濛获得金牌，保加利亚运动员和加拿大运动员分获银牌和铜牌。但是加拿大奥委会认为，保加利亚运动员在冲刺时存在犯规行为，且其在比赛过程中存在对加拿大运动员的犯规行为，因此应该取消其成绩。在内部申诉没有获得支持后，加拿大奥委会遂向临时仲裁庭提起仲裁申请。仲裁庭经过审理后认为：对于比赛判罚，体育仲裁应该尊重更为专业的裁判员的判断，仲裁庭不宜代替裁判员作出判断，而运动员是否存在违规行为是典型的赛场判罚。据此，仲裁庭没有支持加拿大的仲裁请求。

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男子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比赛，金银铜牌均被法国运动员获得。赛后，斯洛文尼亚奥委会和加拿大奥委会分别向国际滑雪和单板滑雪联合会提出申诉，指出法国运动员使用的比赛用服违反了比赛规则，成绩应该取消。但是国际滑雪和单板滑雪联合会驳回了他们的申诉，因为规则要求在比赛结束后15分钟内提出申诉，但是他们超过了这一时间要求。

随后，斯洛文尼亚奥委会和加拿大奥委会继续向临时仲裁庭申请仲裁，仲裁庭经过审理后认定国际滑雪和单板滑雪联合会作出的决定无误，因为比赛规则明确了申诉的要求，即必须在比赛结束后15分钟内提出，且同时需要提交简要申诉理由，支付50瑞士法郎的申诉费用。但在本案中，申请人在赛后6个小时才提起申诉，显然大大超过了规定的时

间。至于申请人提出15分钟的要求过于苛刻、不合理，仲裁庭认为，申诉规则属于体育组织的内部规则，是否合理是体育组织的内部事项，仲裁庭不能干预。从本案可见，仲裁庭不仅严格遵守体育组织的程序规则，而且对体育组织规则本身，一般不予审查。

纪律处罚争议

遵守赛事规则是对所有奥运会参加人员的基本要求。在奥运精神的感召下，奥运会上的严重违规行为较少，因此纪律处罚争议也较少。但是，作为体育领域的毒瘤，兴奋剂违规行为仍然在冬奥会上偶有出现，并被提交给临时仲裁庭解决。这些纠纷都以违规者受到应有处罚而结案。其中较为特殊的一件，是发生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的瓦利耶娃兴奋剂违规案。

北京冬奥会期间，俄罗斯著名运动员卡米拉·瓦利耶娃得到通知，其2021年12月25日提供的样本检测结果呈阳性，但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未对其实施临时禁赛，而是允许她继续参加冬奥会比赛，国际奥委会、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和国际滑冰联合会对于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的决定不服，向临时仲裁庭提起仲裁。

经过庭审，仲裁庭支持了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的决定，没有对瓦利耶娃临时禁赛，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瓦利耶娃提供了证据证明，违禁物质可能是通过与家庭成员接触而摄入；二是瓦利耶娃属于未成年人，经验不足，属于《世界反兴奋剂条例》规定的“受保护人员”，应当对其适当降低证明标准；三是如果对她临时禁赛，将使其错过宝贵的奥运会参赛机会，且无法挽回。当然，仲裁庭也公开指出，其只是对瓦利耶娃是否应该被临时禁赛作出裁决，至于她是否存在兴奋剂违规、如何进行处罚，不在仲裁庭审理范围。

当然，最终瓦利耶娃并没有逃脱处罚。2024年1月，国际体育仲裁院在另一个案件中裁决，对瓦利耶娃北京奥运会期间发生的兴奋剂违规处以4年的禁赛处罚，取消其自2021年12月25日以来取得的所有比赛成绩。

（作者分别为湘潭大学法学学部教授、湘潭大学法学学部硕士研究生）



漫画/高岳

理解马锡五审判：从“微观操作”到“试错实验”

多想一点

□ 刘星

学习法律的人，都知道马锡五。抗战时期，他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长久以来，“马锡五审判方式”备受尊敬，影响了数代法律人。

但有个问题一直不甚清晰，现有历史资料几乎未见讲解——这就是，该审判方式如何微观操作？

有谚语云：“官断千条路，九条人不知。”这句话反映了人们对过去司法官员自主裁量的疑虑。而在纪实文学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即便审理者是马锡五，群众围绕案件仍有分歧，争论并非一下子就完全平息。这表明，办案水平获得很大认可的马锡五，应有拿手技艺。

我们试试，看看能否复盘——从著名案例封棒儿与张柏案入手。

这案复杂，像故事。封张两家，为封棒儿与张柏定了娃娃亲。后媒人撮合，封父收厚礼，将封棒儿许给富裕户。封棒儿一次偶遇张柏，两人生情。封父得知，决定速办封棒儿与富裕户婚事。张柏闻讯，和家人一起抢走封棒儿成婚。

案件中，有四个主要法律问题需要法官研判：自主婚姻，该如何认定？封棒儿与富裕户已经定亲，该如何处置？为女儿订婚收钱，

该如何界定？群众抢亲，该如何惩处？

四个问题彼此牵连，判定其一，均会影响其余。比如，若自主婚姻无效（原初判决即为无效），则定亲有效，订婚收钱不违法，群众抢亲重罚；又如，若自主婚姻有效，则定亲无效，订婚钱财退还，群众抢亲酌判；再如，若认为群众抢亲乡里安全堪忧，重罚，则自主婚姻悬疑，定亲有效，订婚收钱同样。

案件审理过程中，有两个核心：一是婚姻有效与否取决于自主还是定亲；二是群众抢亲如何惩罚。

马锡五亲审此案，他接手后即开展调查研究，和群众交谈。之后，开庭。

翻阅袁静的秦腔剧本《刘巧儿告状》，韩启祥的评书代表作《刘巧团圆》（刘巧儿，刘巧的原型均为封棒儿），均对当时的情形有所描述——

马锡五在村里开庭，依次将四个问题，逐一与群众讨论，联系法律、情理、乡俗，分析利弊，后逐渐聚焦两个核心。马锡五循循善诱，既让群众发言，自己也说想法，慢慢在交流互动中，让群众靠近一个大致共识。

交流互动的细节是，马锡五先提出一个方案——如自主婚姻有效，或定亲有效，或群众抢亲严重，让大家讨论；然后，马锡五分享自己的想法；再后，群众反馈。经过几轮下来，马锡五总结，再问大家是否还有意见。在群众有了大致倾向性意见，马锡五才宣布判决。

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试错实验”。在户已经定亲，该如何处置？为女儿订婚收钱，笔者看来，它应是马锡五的拿手技艺。

“试错实验”，指事先发现问题复杂，没有把握时，先不下断裁，选择逐个尝试，看看哪个选项最优，后下断裁。它是一种通过多方互动，捕获“地方性信息”，逐步调整、验证判决可行性的技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边区法律简略，这需要审判员智慧地平衡法理与情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使审判目标和群众意愿“双向奔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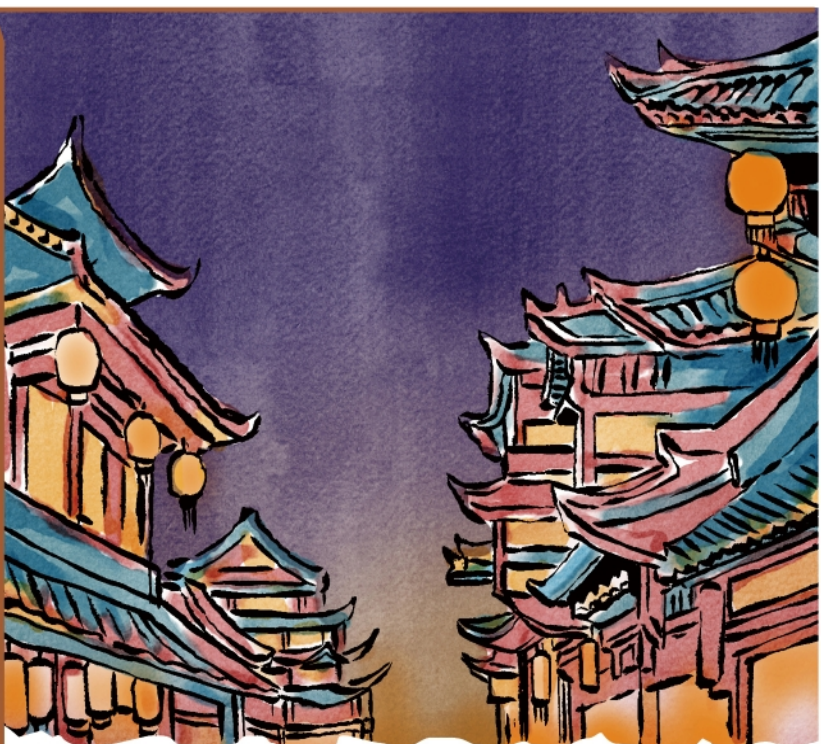
那为什么要宣判，而不调解了事？

“试错实验”，本身正是缘于案件难办。边区婚姻法仅是倡导婚姻自主，而说媒定亲则是民间习俗。当地民谚就说，“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所以，不同的做法肯定各有支持者。哪怕是对群众抢亲这一行为，也有争论。有人说，不抢亲，生米做成熟饭就更难了；也有人说，可以立即通知政府来解决，不必让大家觉得土匪来了。

因此，宣判而不调解了事，是需要对倾向性意见给予法律肯定。上面两个文学作品提到，当宣判封棒儿、张柏婚姻自主有效，群众多数认为“这就对了”，而封父甚为难过，少许群众同情；当宣判群众抢亲犯法当罚，张家不满，多数群众认为应该，少许群众则认为不妥。所以，仅调解没宣判，不行。

有人可能会说，文学作品中的说法不一定真实。这是问题。

但在没有历史资料时，借助文学作品是有益的。《刘巧儿告状》和《刘巧团圆》，在当年很受欢迎，为群众所盛赞。想想看，当受众思想多元，疑团重重时，文学作品不娓娓道来，在矛盾冲突中揭示可行的路径，达至目标，怎



漫画/高岳

□ 崔蕴华

当电视剧《唐朝诡事录之长安》落下华美的帷幕，其所呈现的独特美学仍令人回味无穷。它延续前两季的紧张与悬疑，同时又呈现出新的文人气象。从其所呈现的中国公案美学角度而言，主要有如下特色——

首先是传统中国公案题材的影像致敬与现代转型。《唐朝诡事录之长安》中的主人公苏无名多次提及唐代名臣狄仁杰，其思辨，“狄公弟子”名号贯穿全剧。这个名号不仅体现破案者与名臣的师承关系，让听者敬重，还能让人联想到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狄公案》。

《狄公案》是清人编撰的公案小说，与《包公案》《于公案》《刘公案》等共同汇聚成清代最有特色的公案类型：侠义公案小说。此类小说中，既有名臣断案的情节，也有江湖侠客的丰富描写。更有意味的是，小说将侠客与名臣关联起来，有正义感的侠客辅佐名臣断案，从而让庙堂与江湖把酒言欢。

这种模式一直延续至现代影视剧，如电视剧《神探狄仁杰》中，狄仁杰身边总有武功高强的侠客如李元芳相助。系列电视剧《唐朝诡事录》也延续了这种传统公案的叙事模式，神探苏无名身边便有江湖女侠摆桃一路相携，关键时刻出手相助。

因此，该系列电视剧某种意义上与传统公案气脉相连，人物口中的“狄公弟子”云云，不如说是继承了以《狄公案》为代表的中国公案精神和民间正义想象：公堂审案代表理性正义和严肃推理，侠客厮杀代表浪漫情怀和娱乐精神。“旗亭画壁”案情则将诗心、剑气与家国情怀关联在一起，来自传统却呈现现代叙事风格，令人耳目一新。

其次是案件抽丝剥茧中的历史感与律法精神。“去天尺五”一案因长安两市不断有商人丧命而令人费解。探案者苏无名、卢凌风等人在仔细勘查中不断抽丝剥茧，观众在剧情不断反转中也会带着推理的思考快感。

当案件真相浮出水面，才是整个故事的真正高潮。背后呈现出的乃是士族的前代荣耀与身份焦虑。长安两家士族韦氏和杜氏的阀阅两柱因工地扩建而重现，却被商人何弼砸碎柱角。何弼娶韦家之妹，将后者虐待至疯，将士家与商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韦氏联合杜氏对侵害妹妹的几位商人展开疯狂报复。电视剧中写韦氏宴请士族一起赏宴出土阙阁，众人感慨士族落衰一节，充分呈现了历史上从魏晋至唐代士族的荣耀与落寞，使观众对这段士族变迁史有了更深入的形象感知。

在历史之外，该剧还进一步对法律有所重视和思考。韦氏和杜氏作案手段残忍，且连续杀害多人，但是他们是亲人和族誉报仇，似又情有可原，该案该如何判决？剧中卢凌风一语道出判案依据：“士族荣耀从不是凌驾律法的理由，若人人都凭借身份，主断是非，律法便成了一纸空文，天下必将陷入混乱。”这是法律精神的尊重，尤其卢凌风本人便是范阳卢氏的后人，作为唐代顶级士族，能对士族犯罪理性看待，更显示出对法律之尊重超越身份之固化。

电视剧对案件的判决往往能在基本尊重法律的同时兼顾情理，如“诺皋记”嫌疑人红药在张三的尸体上连砍几刀，虽不涉及谋杀人命，但按照律法应判处徒刑或死刑，唐律对毁尸按斗杀减一等论处。此案中的张三和民间宅威威胁红药，后被毒蛇缠绕窒息而死，红药对其刺杀行为自然可以酌情减等，因此处徒刑也算兼顾法律与实情。而红药最后自己选择死刑，则体现了她对丈夫的亲近之爱远超过对自身容颜之爱。此处的判决可谓有三重含义，兼顾国法、人情，也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实在巧妙。

最后是传统志怪题材的浸润与升华。《唐朝诡事录之长安》之“诺皋记”通篇与中国志怪小说有着不解之缘。长安小吏孟不疑爱写志怪笔记，他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神都怪录》《西京志异》，甚至连主人公苏无名都说要写志怪来赚钱，可见志怪受欢迎之程度。故事开始，孟不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爱妾深夜骑一口大红缸而去，飞越秦岭、江淮及洞庭湖，去远方和会情人，他自己恰恰藏在这口大红缸里。

这个场景应来源于唐代志怪传奇《广异记》“尸部令史妻”中妻驭马、婢骑瓮深夜外出情节。在唐代传奇中，妻、婢这样做乃是中了魅魔，而将这个古典元素放在电视剧中则多了现代人对情节和人性的考量。该志怪元素反映了孟不疑内心的某种焦虑，或者说这些奇特梦境都与他创作志怪息息相关——焉知这个情节不是他创作的源泉或成为创作的一部分？

剧中另一故事“去天尺五”中有“风狸杖”情节，长安奇杖店有卖。该志怪元素正来自唐代笔记《酉阳杂俎》“诺皋记”下“南中有兽名风狸，如狙，眉长好，见人辄低头，其弱能理风疾。卫士多言风狸杖得于鹑形箭……有得之者，禽兽随指而毙。有所欲者，指之如意。”这段唐代志怪启发了编创者，“其弱能理风疾”成为侦破命案的重要线索，与剧中韦府头痛密切相关，且“风狸杖”成为情节的重要推动，苏无名通过买该杖发现神秘地道直通鬼市，案情逐渐明朗，而摆桃听苏无名介绍交手杖之神奇后，两人的对话也将内心相互倾慕之情随杖点出，趣味盎然。

如何利用传统文学资源与法律资源，将其与现代技术和影像相连接，并呈现出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性，《唐朝诡事录之长安》的尝试给了我们新的启发。从《哪咤》到《黑神话》，再到《唐朝诡事录》，我们看到了传统的新生与时代的心声。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上接第五版

面对手段不断翻新、防范压力持续存在的电信网络诈骗，喀喇沁旗通过向老年群体精准投放印有防骗标语的围裙、纸抽盒等“法治年货”开展靶向宣传，切实增强老人们防范意识和辨别能力。许多老人不仅自身提高了警惕，更主动化身“村、社区的‘银发哨兵’”，积极识别并提醒邻里风险。正如一位大娘所说：“围裙上的字，天天做饭都能看见，比孩子电话里嘱咐多少遍都管用。”

通过扑克牌、宣传册等形式开展的趣味化、接地气普法，在潜移默化中有效净化了社会风气。基层普遍反映，涉邪教类问题已显著减少，崇尚法治、健康文明的价值观在乡村公共文化阵地牢牢扎下了根。

综合施策带来的直接成果是社会治理效能的系统性提升。2025年，喀喇沁旗社会治安满意度达98.2%，与此同时，因纠纷引发的治安案件数量呈下降趋势——这意味着全旗范围内避免了多起可能激化升级的冲突，将大量基层警力与行政资源释放于更高效的平安服务，一个“发案少、秩序好、矛盾易解”的良性治理生态正在形成。

日头偏西，集市的热闹渐渐散去。人们提着满载的年货满意而归，那些轻巧的钥匙扣、温暖的棉手套、朴素的围裙，也作为一份独特的“法治年货”，被带进了千家万户。这套名为“精准滴灌”的基层普法实践，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注脚，它送出的不仅是一份年货，更是对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现代化路径的一份温暖的期待。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